

本书编写组编著



中共风云 九十年

〔下卷〕

本书编写组 编著

中共风云九十年

(下卷)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风云九十年 / 陶永祥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21-09524-4

I. ①中… II. ①陶…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305 号

出品人
许 明

总策划
刘金田 曹维琮

总监制
李立朴

项目统筹
曹维琮

责任编辑
陈 荣 阎循平
朱智毅

封面设计
TT 工作室

电脑制作
曹雨锋

中共风云九十年 (上、下卷)

本书编写组 编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发行电话
0851-6828477 (贵阳) 010-57173073 (北京)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50.75 字数 800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9524-4

定 价
98.00元 (上、下卷)

这部画传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画传编撰工作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和科研管理部的部分青年学者。在各人分工撰写初稿的基础上，执行主编陶永祥副研究馆员对全书文字进行了统稿。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文中肯定存在不少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刘金田研究员和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曹维琼策划了本画传。刘金田负责通读了全稿，并对部分章节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还在衷心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颜小鹂女士和本书的责编陈荣、阎循平、朱智毅先生，以及本画传的美术编辑曹雨锋先生等。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画传的出版是难以想象的。

编 者

2011年3月

《中共风云九十年》

(上、下卷)

执行主编

陶永祥

执行副主编

唐 斫 王 萍

王 翠

撰 稿

王 萍 王 翠

李雪莲 曾 珺

胡鹏飞 唐 斫

益 蕾 陶永祥

图片统筹

魏 芬

图片摄影者及提供者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峻	卜云彤	于小平	于 桑	马占成
马 宁	马 平	马 闯	马似友	马 肖
马俊田	马竞秋	马 窠	公 磊	区用诚
文贻炜	毛众役	毛松友	牛正武	王子瑾
王小川	王双正	王 文	王永卓	王 冰
王华斌	王红玉	王呈选	王呈选	王 孝
王纯德	王 迎	王 坤	王 岩	
王建民	王家国	王能标	王 颂	王 萍
王新庆	王溶江	王锦秋	王 雷	王 颖
王 鹏	王 翠	车 夫	兰红光	卢汉欣
卢 鸣	卢 哲	叶子龙	叶 炜	白连锁
石少华	艾力肯	艾尼瓦尔		龙 涛
任远远	任 勇	刘卫兵	刘心宁	刘东鳌
刘玉生	刘 宇	刘建生	刘建国	刘金田
刘爱国	刘 敏	刘 续	刘 颖	吕小炜
吕传泉	壮 锦	孙忠靖	孙彦新	安 东
安克仁	安 康	庄 唯	朱大伟	朱旭东
朱 峥	朱 祥	朱新通	汤孟宗	邢广利
齐观山	齐铁砚	何俊昌	吴森辉	宋佑民
宋振平	张刘仁	张 旭	张宏祥	张宝忠
张 郇	张桂玉	张海霞	张 耕	张瑞琪

张肄文	时盘棋	李 文	李必达	李 刚	李运昌	李学仁	李 岳
李晓果	李雪莲	李紫恒	杜华举	杜修贤	杜 毅	杨卫华	杨绍明
杨 楹	邱海鹰	邵守志	邹典佐	邹 峥	邹 瑜	邹 毅	陈小波
陈 飞	陈天湖	陈亚江	陈 凯	陈凯星	陈建力	陈建华	陈沫军
陈思禹	陈柏梁	陈树根	陈娟美	陈晓根	陈海宁	陈斌荣	陈瑞华
陈 燮	卓天然	周文广	周文杰	周 华	周同惠	周 良	周重要
周晓云	周寅杰	周铭鲁	周 超	周 磊	周衡义	宗金柱	屈明光
庞兴雷	林 扬	林群英	欧阳海员		欧阳萍	武 敌	武基国
武清月	罗晓光	范 青	郑小箴	郑景康	郑震孙	侯少华	
哈里曼·富尔曼	姚大伟	姚法昌	宫天一	查春明	柳中央	胡泽君	
胡海昕	胡鹏飞	胥志成	觉 果	赵天聘	赵 鹏	钟小丰	钟 华
钮一新	饶爱民	唐召明	唐京伟	唐 斫	唐理奎	埃德加·斯诺	
夏道陵	徐壮志	徐 步	徐肖冰	徐家军	格桑达瓦	益 蕾	
秦有为	秦智渊	袁 苓	郭占英	郭 程	钱 彤	钱学森	钱晓虎
钱嗣杰	铁 矛	陶永祥	陶 明	高 风	高 良	高学余	高 洁
高耿文	高梅及	崔宝林	曹卫国	曹文星	曹兴华	曹 彤	曹 凯
曹桂江	梁 子	梁伯权	章 武	喻湘泉	彭 洋	曾 珺	焦卫平
程 敏	程 默	蒋 林	蒋 林	蒋 铎	谢丰泉	谢环驰	韩传号
虞 永	熊汝清	蔡志培	蔡忠植	蔡增乐	蔺以光	裴 鑫	樊如钧
潘家珉	黎 民	鞠 鹏	魏 芬	魏培全	魏 辉	魏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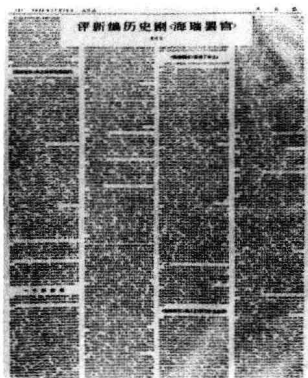
注：本书所采用的图片均来源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及新华通讯社授权使用的新闻图片，除已经联系上的图片著作权人及其继承人外，还有部分著作权人及其继承人未能取得联系，本书出版后，请本书所涉及的著作权人及其继承人与我社联系，请告知我社，便于我社及时支付报酬。

谢谢！

十年内乱

1966-1976

1966年，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历时十年的内乱，给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造成严重的灾难。由于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抗争，使其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我国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92.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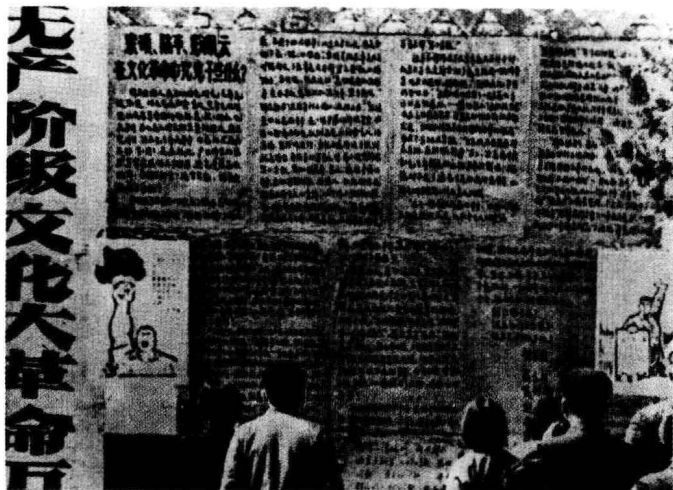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开展起来，并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这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件事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的剧本，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创作的。姚文元在文章中虽点名批判吴晗，实际上却涉及了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图为张贴在北大校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同意见。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秘密策划下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他指示由上海单独出该文章的小册子，并批评北京市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小范围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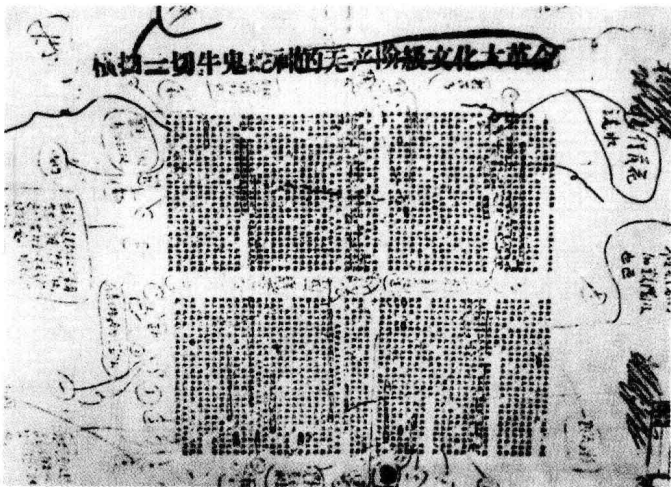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文化大革命”中迭遭批判的《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力求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它变为过火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文章。这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

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次日，该报发表经他修改定题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图为修改后的社论稿。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四个人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毛泽东三次审阅了座谈会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建议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转发全党。《纪要》第一次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即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的产生标志着林彪与江青相互勾结、篡党夺权的开始，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先后因无中生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或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这个“文革小组”实际上作为一个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特殊机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又先后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继续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在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康生授意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1966年12月25日，受张春桥的指使，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率人在天安门前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群众游行队伍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的一张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一时间,各地大中学校很快掀起“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现象不断发生。

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此事经江青、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片面汇报后,被毛泽东指责为“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7月28日,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再次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不久就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由此，“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发动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三、斗、私、修、修、斗、私、修、修
- 四、以阶级斗争为纲
- 五、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 六、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
- 七、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八、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九、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一、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二、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三、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四、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五、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六、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八、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十九、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二十、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文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93. 全面内乱

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全面发动起来了。首先起来响应号召的，是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一些所谓“勇敢的闯将”，利用青年学生那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对党和毛泽东的热爱，带头组织了一个笼罩着红色的光环的“红卫兵”组织，并很快扩展到全国所有大中学校。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大搞“打、砸、抢、抄、抓”。一部分红卫兵为盲目的政治热情所支配，到处“炮打”党政领导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这大大助长了红卫兵的“造反”热情和在全国大串连的行动，也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

1966年10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就为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提供了依据并使之合法化。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绝大部分权力逐渐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全国各级党政组织基本上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各地迅速陷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一切”的狂潮之中。刘少奇、邓小平被诬陷为“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彭德怀被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贺龙被诬陷为“大野心家”、“大土匪”等等。

从1967年1月开始，以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为发端的“全国夺权”风暴，使全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灾难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了权，成为“一月风暴”的前奏。2月5日，随着以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正式成立（经毛泽东修改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被完全篡夺。这场夺权斗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夺权风暴由此开始，并迅速蔓延至全国，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

从1月12日山西省造反派组织宣布“接管原山西

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图为1967年1月31日，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挂牌成立。

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开始，到1968年9月西藏、新疆建立革命委员会止，全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全面夺权”的过程中，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上海“一月风暴”所引发出的这种全国混乱局面，把全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这也是毛泽东之前所未曾预料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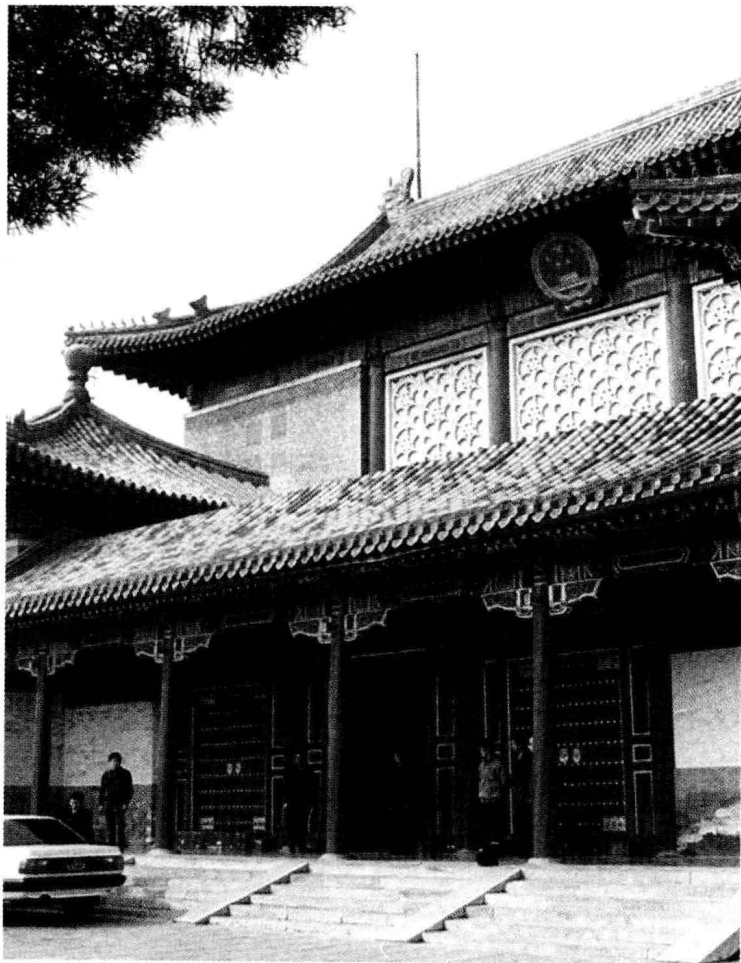
94. 二月抗争

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面对“全面夺权”造成的全局性混乱状态，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



1967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大义凛然的抗争。这次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周恩来被指责为“二月逆流总后台”。图为中南海怀仁堂。